

先秦頂級文臣

黄朴民 白效咏 李君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K827/696

:1

2007

「历代顶级文臣系列」

丛书主编◎毛佩琦教授

先秦頂級文臣

黄朴民 白效咏 李君 著

泰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顶级文臣 / 黄朴民, 白效咏, 李君著. —石家庄: 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07

(历代顶级文臣系列)

ISBN 978-7-80673-742-2

I. 先... II. ①黄... ②白... ③李... III. 大臣—列传—中国—先秦时代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9860 号

先秦顶级文臣

作 者: 黄朴民 白效咏 李 君 丛书主编: 毛佩琦

责任编辑: 兰小宁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责任校对: 成 仁

特约编辑: 倪新玉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6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742-2

定 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大夫的理想。读书人身处草野时，他们没有施展的舞台，只能修身齐家，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而已；但是在野的读书人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民生，心系天下兴亡，他们在观察，在分析，在储备智慧和学养，一旦有机会，就要干预社会生活，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是也。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书虫，不是冬烘先生。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能泯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些士大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呢？这又要说到中国古代士大夫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要忠心辅佐明主，或者把自己辅佐的人培养成明主。他们自己决不坐天下，只做帝师，辅佐明主坐天下，去实现他们的治国理想。我们历数古代的名相、名臣，从先秦的管仲、乐毅，到汉朝的霍光、蜀汉的诸葛亮，从唐朝的魏征、宋代的赵普，到元代的刘秉忠、明朝的刘基，莫不如此。刘备三顾茅庐，隆中问计，请诸葛亮出山，朱元璋聘请浙东刘基、叶琛、章溢、宋濂到自己的军中，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种种故事，向来脍炙人口。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人的官都做的，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他们认定的“道”不能实行，他们宁可不做官。

那么，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他们心中的“道”是什么？换句话说，作

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终极关怀又是什么?一言蔽之曰:“安民”。

如何安民?扫灭群雄,一统天下是安民;制礼作乐,建立秩序是安民;治水开山,兴农殖货也是安民。为了安民,他们展现出惊人的胆略和智慧;为了安民,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了安民,他们呕心沥血,不惜拼死直谏。他们的安民,往往是通过忠君来表现的。忠君是手段,安民才是目的。阿谀逢迎并不是真的忠君,“以道事君”,不惜犯颜直谏,使君归于正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靠什么安民?有一个著名的掌故,说到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历仕太祖、太宗两朝,三度为相,他曾对宋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不论是戡乱平叛、统一天下,还是富国裕民、臻于至治,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都只用半部《论语》就够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手中的法宝,他们认为以此治国平天下将无往而不胜。其所以能够取胜,则在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爱民才可以安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爱民就无往而不胜,半部《论语》足矣!

历代文臣治国,也并非纯用儒学,儒、兵、法、道等等,不免杂用。历代治世能臣,也并非都能够一帆风顺,施展才华。有人有幸遭遇明主,受到信任,柄政握权,一展抱负;有人明珠投暗,受到猜忌,被人嫉恨;有人生居显赫,死蒙哀荣;有人功成身退,百代流芳;也有人作威作福,遭人唾骂。治世能臣也各有七情六欲,甚至并非正人君子。而他们每个人的不同际遇,不同风采,又各留有一段生动的故事,可供我们品味和咀嚼。他们在治国安邦中展现的高超智慧和精湛谋略,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供我们继承和借鉴。至于那些品德高尚,心系百姓忧乐的仁人们,借用宋代范仲淹的话说,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堪称读书人的千古风范了。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毛佩琦

2006年10月31日

于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先秦頂級文臣

一 目 录 一

- 1 / 制礼作乐的元圣周公
- 19 /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贤相管仲
- 39 / 助楚称霸的第一循吏孙叔敖
- 53 / 胸怀阔大的政治家子产
- 71 / 坦荡洒脱的季世贤相晏婴
- 87 / 充满悲剧气息的忠臣良将伍子胥
- 103 / 三徙必有荣名的范蠡
- 125 / 胸怀九术的霸佐文种
- 141 /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商鞅
- 157 / 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
- 173 / 连横霸秦的张仪
- 191 / 国家利益至上的蔺相如
- 201 / 争光日月的屈原
- 219 / 忍小辱成大事的范雎
- 235 / 志在经国的巨贾吕不韦

制礼作乐的元圣

周公



拂开尘封的书卷，剥除后人有意无意加在他头上的耀眼的光环，走近历史的真实，却发现这位被后人抬到『圣贤』位置上的老人的一生，绝非丰富多彩之类的词语可以形容！作为儿子，他是那样的温柔恭顺；作为兄弟，他对武王是那样的尽心竭力，对管叔、蔡叔又是那样的无情；作为周初的代理天子，他是那样的英明果断，毫不扭捏作态；作为辅佐幼主的大臣，他又那么循规蹈矩。他临事果敢，绝不向叛乱势力妥协；他求贤若渴，『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虽然已远离我们数千年之久了，他的许多事迹，仍然对我们有着启迪意义。



在儒家所尊奉的先圣先贤中,如果“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居第一把交椅的话,那么被尊为“元圣”的周公则应是“太上皇”了。他在周王朝建立的初期,果断出手,及时镇压了殷商遗老遗少的反扑和诸侯的叛乱,稳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他制礼作乐、封建诸侯,奠定了周朝八百余年的统治基础。为了报答他的丰功伟绩,周天子特许他的鲁国用天子礼乐。在那“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时期,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后世儒者对此津津乐道、顶礼膜拜,连他们的开山祖师孔子也不例外,他对周公所作的礼乐极口称赞:“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至公开宣称自己“述而不作”,一生以阐发周公的“斯文”和恢复周王朝的礼乐为己任。崇拜到极点了,甚至每晚睡觉都要梦见周公。晚年有几次没有梦到,心里便惶惶然,闹得这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圣人竟然也大发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担心自己真的老得不行了。拂开尘封的书卷,剥除后人有意无意加在他头上的耀眼的光环,走近历史的真实,却发现这位被后人抬到“圣贤”位置上的老人的一生,绝非丰富多彩之类的词语可以形容!作为儿子,他是那样的温柔恭顺;作为兄弟,他对武王是那样的尽心竭力,对管叔、蔡叔又是那样的无情;作为周初的代理天子,他是那样的英明果断,毫不扭捏作态;作为辅佐幼主大臣,他又那么循规蹈矩。他临事果敢,绝不向叛乱势力妥协;他求贤若渴,“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



发,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不是没有私心,封建诸侯时,把同姓的兄弟叔侄,大概只要不疯不傻都封到要地沃土。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万能圣人,当被小人诬陷而引起成王的误解时,他也只能无奈地出逃。虽然已远离我们数千年之久了,他的许多事迹,仍然对我们有着启迪意义。

周公的身世及周王朝的发迹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弟弟。同母兄弟十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周公排行第四。周文王把古公亶父所居周地赐给他作为采邑,所以称他为“周公”。在武王灭商之后,被封于鲁(今山东曲阜一带),成为鲁国的第一位君主。纵观周公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积极准备灭商,成为周文王、周武王的得力助手。这一时期奠定了他在周王朝统治集团极为重要的地位。周文王死后,他成为仅次于周武王的第二号人物。不幸的是,周武王还未来得及稳固周王朝的统治,便在灭商之后的第二年驾崩。当时天下岌岌可危,周公为了稳定形势,毅然做了七年代理天子。在这期间,他消除了全部不稳定因素,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待形势根本好转之后,又复成王之“明辟”。这是周公的第二阶段,也是他最为辉煌的时期。之后他退守臣藩,这是他的晚年。史籍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活动,记载得颇为阙略,我们已经不能详知了。

按照我们的惯例,写一个人物,首先要追溯其祖宗三代。巧的是,周王朝的兴起,恰恰在周公的三世祖古公亶父时期。初期的周不过是一个偏处西部的小邦,处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据传他的始祖是后稷,在尧帝时曾为农师,善于搞农业生产。“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到商朝末期,经过数代君主的努力,周的势力已经有所发展壮大。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古公亶父。在他继立为君主时,还居住在豳地。据说他“复修后稷、公刘

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但是这一时期，周的军事力量看来还比较薄弱，对于戎狄的多次进犯，基本无力抵抗，都是采取妥协求和的办法。但是，以妥协来换取和平，永远是弱者的一厢情愿。戎狄的贪欲毫不费力地一次次得以满足，反而刺激起他们更大的野心，由索取财物进而至于索取土地。这时的周实际已无退路，在反复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实力之后，古公亶父大概觉得打的话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吧，在“民皆怒，欲战”的情况下，竟然选择了携家出逃，一直逃到岐山之下。这次逃跑就是《诗经》里所歌颂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他在逃跑之前发表了一番颇有煽动性的演讲：“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以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大意是说：人民立君主的本意，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戎狄来攻打我们，就是看中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归谁领导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你们愿意为了我跟他们打一仗，可我怎么好意思让你们为了我而去牺牲呢？这番谎言还真的起了大作用，老百姓被感动得扶老携幼，一起跟着他逃到岐山之下定居。甚至周边国家的民众也被他的“义举”感动，争相归顺。从那时起，周这个蕞尔小邦才一步步强大起来，也使得这次逃跑成为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战略大转移”。“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这样就奠定了周的政权基础。《诗经·鲁颂》说：“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恰恰说明周的兴起实际上就是在这次成功的大逃亡之后。

继古公亶父而立的是季历，也就是周公旦的祖父。据说季历之所以得立，大半是因为周公的父亲也即文王姬昌。相传姬昌降生的时候出现了许多“祥瑞”，显示这孩子将来一定不同凡响。他的体貌也迥异于常人，“龙颜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一说他“日角鸟鼻，高长八尺二寸”。当然，两个说法在身高方面相差整整一尺八寸，不可能都对。古公亶父非常喜欢这孩子，认为这孩子是帝王之相，可以振兴他们的国家，便有意把位置传给季历，好为姬昌继位铺平道路。季历的两个哥哥——太伯和虞仲也是识相





的人，他们在看破古公亶父的心思之后，便一个奔吴，一个奔越，主动放弃竞争。二人的成人之美使得季历顺利地被立为周的君主，好在他也能够“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没有辜负父兄的一片好意，继续将事业发扬光大。这时，周边的诸侯也开始归顺他们。

当政权传到周文王姬昌手里时，周的发展的势头得到进一步强化。从姬昌继位后称“西伯”来看，周已经成为商王朝西部方国的霸主了。具体说来，姬昌继立之后，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一、总结并继承祖上成功的经验并发扬光大。史称其“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季历之法”。周由一个不起眼的部族发展成为西部有影响的大国，深得周围诸侯国的拥戴，其中肯定有其成功的经验。周文王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在发展的同时能很好地继承这种经验，接着做下去。一方面能够使政权顺利过渡，缩短新旧交接的适应期；另一方面也把周在周围诸侯国中业已形成的权威成功地延续下去，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修身立德，以仁治国，“笃仁，敬老，慈少”。韩非子在谈论治国方略时，曾明确地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应该说他这个概括还是十分准确的。殷周易代之际，还处在社会发展的较为低级阶段，道德在政治上有着强大的感召力。一个君主如能修身爱民，往往能够很快地收拢人心，赢得民众的拥戴。而民众的多寡又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直到战国时期，孟子还屡屡称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豢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把它当作仁政爱民的典范。三、礼贤下士，招揽人才。《史记》称其：“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这一招最能凸现姬昌的高明。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国家要强盛，人才总是第一位的。不懂得尊重人才使用人才的国家，永远不可能强大。一个成功的领导，自己不一定多么能干，关键在于要能团结人才、使用人才，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姬昌的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具有两层意义：一方面把大批的人才聚拢在自己周围。“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

往归之。”“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另一方面又挖了已经没落的商王朝的墙脚，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辛甲和太公姜尚都曾是纣王的臣子，“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最终都经不起姬昌“人才政策”的诱惑而被拉拢过去。事实证明，这些人才在周商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纣王将姬昌逮捕囚禁在羑里的危难时刻，正是闳夭等人出奇计，以美女宝马贿赂纣王，才将姬昌换了回来。而太公姜尚更是成为周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兴周灭商的规划，大半出自其手。

周的逐步强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一些亲商的诸侯国也时刻注意周的动向，不时向商王朝报告。这时的商、周之间，多次出现武装冲突，这在已经出土的甲骨文中多有记载。但总的来说，“百足之虫，死而未僵”，商王朝在军事上仍然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再加上商王朝还拥有天子的名分，属于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所以这一时期，商王朝仍然在商周关系上占有绝对优势。亲商的崇侯虎敏锐地感觉到西伯的活动很可能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便向纣王告发他。“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老于世故的西伯当然明白，在无力战胜敌人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敌人放松对你的警惕！他很快以屈服来表示自己仍然尊重中央政权的权威。西伯成功的示弱，让喜欢“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纣王在心理上又好好满足了一回。为了营救西伯，闳夭等被西伯招揽进来的人才决定以“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来贿赂纣王。目光短浅的纣王本来就是“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之徒，他继位之后，把自己贪财、好色、耽酒、爱玩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虽然治国是外行，在怎样玩方面则是绝对的高手，翻新出许多花样来。据说，他把池子里面灌满酒，荡舟其中，随饮随取；还把肉挂满树林，随吃随烤。纣王一见到美女竟然连连称好：“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不仅答应放了西伯，一高兴之下，还“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因祸得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军事





特权。更要命的是，他把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崇侯虎也给出卖了，竟然直接对这帮人说：“潜西伯者，崇侯虎也。”使得崇侯虎直接暴露在西伯的火力之下，四年之后被西伯借助征伐的特权将其灭掉。而西伯又趁热打铁，再给他灌一壶迷魂汤，“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在进一步稳住纣王的同时，又为自己赚足了人气。在这场交锋中，老练的西伯完胜刚愎自用的纣王，从此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逆转，周开始了战略反攻的新时期。

西伯归国之后，继续积蓄反商的力量，拉拢诸侯，“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威望日隆，以至于诸侯之间有了纠纷都来找他评判是非。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即开始着手灭商的大业。他先灭犬戎，稳定了后方，随后又灭掉密、黎两个小国，以觐纣王的反应。这无疑是对纣王“天下共主”地位强有力的挑战，商王朝的一些明白的大臣再也坐不住了，王子比干、伊尹等人相继劝谏纣王，提醒他要收敛花天酒地的生活，老百姓已经对此忍无可忍了。好好想想办法，及早收拾局面。如果每一位君主都能从善如流的话，世界上也许就没有亡国的悲剧了。大臣们的热脸碰了凉屁股，一番好意被纣王一句“我生不有命在天”给顶了回去。纣王的昏庸给西伯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他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又借机灭掉了崇侯虎，报了一箭之仇，并在丰建立了新的首都，作为反商的基地。这时商周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实力上来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已由过去的小邦变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国；从舆论上来说，随着纣王的胡作非为，在诸侯中间，商王朝的威信不断降低，而周“阴谋修德”和对商示弱做法则日益赢得诸侯的同情。大家都认为周已经足够对得起商王朝了，如果纣王不听劝谏，一意孤行，那么天命就有可能改易。后来，孔子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大发感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表明，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只可惜西伯没有来得及亲自完成灭商的大业就去世了。

灭商战争与周公政治地位的提升

作为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是在商周激烈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经历了商周力量对比逆转的整个过程，亲历文王励精图治，使周从弱小的邦国发展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国的经过，这对他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从小接受的这些良好的政治熏陶，对周公将来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有着重要的帮助。另据史料记载，周公早年时期便与众不同，非常的聪明仁爱，大概属于少年老成的那种。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他“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在同母兄弟十人中，他与武王姬发最受文王宠爱。周文王在位时期周公即已崭露头角，和武王一起“左右辅文王”，成为文王兴周灭商的重要助手。周在与商斗的过程中从小邦一步步发展壮大，其中肯定凝聚了周公不少的心血，只是由于史籍的阙略，我们已经无从考见了。

在武王继立之后，周公的地位上升很快，不久即成为周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据《史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则周公成为仅次于武王、姜尚的第三号人物。武王继位后的第二年，对商王朝发起了一次军事试探。这时武王对自己能否服众还没有太大的信心，所以打的还是他老爸的旗号，“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以姜尚为总司令，率兵东进，直至孟津。叛殷归周的诸侯全来参加这次军事演习，据说达到八百之多。大家都极力劝说武王趁机发动推翻商王朝的战争，出于谨慎，武王没有答应。作为武王的股肱大臣，周公也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表明，新继位的武王得到诸侯的拥戴，伐纣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下一步只是找借口的问题了。

面对周的步步进逼，商王朝的统治危机日益严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种情况使得殷王室的贵族忧心忡忡。而那位迷信天命的纣王却





“愈淫乱不止”，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一种绝望的情绪在商的贵族中弥漫开来，他们暗暗感到国亡无日，大祸将临，“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纣王的庶兄微子多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结果却“有如东风射马耳”！伤心绝望之余，在和父师、少师等谋臣商量之后，他满怀惶恐又迷茫的心情出走避祸。另一位贤者王子比干，在反复权衡之后，决定拼死相争，犯颜强谏，以冀唤醒纣王的良知，挽救国家的危亡。不料惹得纣王龙颜大怒，残忍地将比干剖腹挖心，借口竟然是想看看比干的心是否和圣人一样，都是七窍的！二人的遭遇使得箕子更加绝望，他深切地感到，相对于周的进攻，来自荒淫无耻的纣王的威胁离他更近！他已经不可能再对挽救国家做什么了，因为他的面前横着纣王这座大山！为了逃避迫害，他只得装疯卖傻，“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可惜即便如此，还是未能逃脱纣王的慧眼。他大概看出了箕子对他的不满，把箕子给囚禁起来。孔子所谓的殷之三贤，不仅未能挽救殷商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纣王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彻底瓦解了殷商的力量，极大地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也给了武王以极好的借口。周君臣决定抓住这个良机一举灭商，完成他们的夙愿。于是他们将纣王虐待殷三贤的罪状遍告诸侯，再次带着文王的木主，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击商王朝。周伐商的行动得到绝大部分诸侯的支持，他们纷纷带兵随周出战，表示和商王朝决裂，拥戴周武王。当大军来到商郊牧野时，周公帮助武王在此誓师，作《牧誓》，历数纣王的罪过，颁布军规军纪。指责他听信妇人之言，不重用自己的亲属，不认真搞好祭祀，把国家交给一些不务正业的人来治理。总之，纣王的这些行为伤害了百姓，上天发怒了，我们伐纣灭商，乃是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之义举。各位诸侯跟随我作战，辛苦了，要遵守军纪，勇往直前，优待俘虏，不然也要受到惩罚。之后，总司令太公姜尚发布了总攻令。战争的进程毫无悬念，只是印证了孟子的话：“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两军甫交锋，纣王所临时拼集的乌合之众便阵前倒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周军



很顺利地攻了进去。纣王见大势已去，他坚信的“天命”也派不上任何用场，便把积攒的珠宝玉器披挂满身，登上他平时享乐的场所鹿台自焚而死，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

在灭商的规划和战争之中，周公虽然也是文王、武王的重要助手，但地位显然不如太公重要。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所以周初武王大封功臣时以太公为首：“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这是因为当时激烈的斗争形势使得周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善阴谋多奇计的太公。

灭商之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摆在周王朝统治集团面前的是亟须收拾灭商后的残局，重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这就使多才多艺的周公旦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其地位也有了明显的上升。在一系列的重要事务的处理上，他都作为武王最为重要的帮手出现在武王左右。诛杀纣王的第二天，武王要举行告天仪式，即天子位，“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最终完成了政权的交接。

周初的政治危机及七年的代理天子

周王朝建立后，所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巩固统治问题。武王虽然倾覆了商王朝的统治，但并未彻底消灭商的势力，一些亲商的诸侯国对周代商并不服气，而商王朝的直系势力更不死心。他们仍然在聚集力量，伺机反扑。对于这一点，周武王看得非常清楚。二是如何建立周王朝的统治模式问题。这个问题一旦确定下来，就要为后来之君主所遵而勿失，因此这个模式要能够保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两个问题既棘手又刻不容缓，周武王为此忧心忡忡，以致夜不能寐。故而，尽管他在大封诸侯时封周公于鲁（今山东曲阜）地，但并未让周公前往



就国，而是留下来辅助自己共同制定周初的政策，谋划立国的规模。

关于这些问题，周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在如何处置殷商的残余势力方面，行伍出身的姜太公为永绝后患，即提出杀尽斩绝的血腥主张，另一位位高权重的召公则主张将曾帮助纣与周政权对抗那部分人杀掉而将其余的赦免，即“杀有罪活无罪”原则。这两种主张看起来都似乎有理，然而一旦执行起来，却不得不面临巨大的问题：首先，对所谓敌对势力即殷逸民大挥屠刀，不可能不引起他们最为激烈的反抗，须知周对商的胜利，是建立在商的军队倒戈的基础上的不战而胜。至于双方实际力量的对比，具有七百余年统治基础的殷商的实力绝非如此不堪一击。因此，在周王朝统治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主动出击以激起殷商残余势力的反抗，绝非上策。其次，周王朝之所以由一个实力很不起眼的西部边陲小邦发展到取商而代之，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古公亶父起的诸位君主力行仁政，民心所向，从而在诸侯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这种大挥屠刀的政策势必会对周王朝累世君主所树立起来的美好的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而失掉民心。而民心不正是商之失天下和周之得天下的最根本因素吗？

在权衡了各种因素后，周公向武王建议，对待殷商残余势力要以安抚为主，同时要加强对他们的监控，以防反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商定了立国之初的政策：第一，对于殷商的残余势力推行安抚与限制并行的政策。“启以殷政，索以周疆”，在他们服从周王朝统治的前提下，保留了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立商王纣的儿子武庚作为他们新的国君。同时“释箕子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这些殷商的旧贵族在商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公认的贤人，又是纣的反对派。周公对他们成功的拉拢，既显示出周王朝礼贤下士的宽广胸怀，又彰显了纣的罪恶，对于安抚商人之心起了重要作用。至于“鹿台之财”和“钜桥之粟”，早就成为纣的罪证，借纣聚敛起来的财富，赏赐天下，收买了人心，可谓一举多得。但是，周公对商人的宽容既不是无原则的退让，也不是愚仁，是既拉又打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其目的就是